# 目录

拿破仑与毛皮商人
名人也“ 啬皮 ”
笑声长留人间
留学巴黎
徐悲鸿的画格与人格
他放走了希特勒
“ 汉奸 ”郭嵩焘
讲台上的名家风采
从牛痘到抗生素
教师与总统
可怕的博尔曼
陈景润的罗曼史
爱因斯坦的悼词
贝多芬只有一个
俞平伯
她是美国第一座女人雕像
白求恩的遗嘱
20 世纪两位物理大家的风格
百年黄埔
痴情的“ 侦探小说女王 ”
左宗棠之死
拿破仑的帽子
大科学家的失误
个体对抗野蛮：无法选择的命运
设想舒伯特
结拜、兄弟联盟与政治企图
英雄

# 正文

## 拿破仑与毛皮商人

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他的部队在一个无比荒凉的小镇中作战，当他意外地与他的军队脱离时，一群俄国哥萨克人盯上了他，开始在弯曲的街道上追逐他。拿破仑开始逃命，并潜入僻巷中的——家小毛皮商人家。当拿破仑气喘吁吁地逃入店内时，他对毛皮商人可怜地大叫：“ 救救我！ ”

毛皮商说：“ 快点，藏在角落的那堆毛皮底下！ ”然后他用很多张毛皮盖住拿破仑。

他一盖完，俄国哥萨克人就已冲到门口。不顾毛皮商人的抗议，他们把他的店给拆了，想找到拿破仑。他们将剑刺入毛皮内，但是没有发现他。不久，他们放弃寻找并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正当拿破仑的贴身侍卫来到门口时，拿破仑毫发无损地从毛皮下爬出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毛皮商向拿破仑胆怯地说：“原谅我对一个伟人问一个问题，你躲在毛皮下，知道下一刻可能是最后一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拿破仑站稳身子，愤怒地向毛皮商人说：“你竟然敢对拿破仑皇帝问这样的问题！警卫，将这个不知轻重的人带出去，蒙住眼睛，处决他。我将亲自发布枪决命令！”

警卫捉住那可怜的毛皮商人，拖到外面面壁而立，蒙住他双眼。毛皮商人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他可以感到警卫的动作，当他们慢慢排成一列，准备他们的步枪时，他可以听见自己的衣服在冷风中作响，他可以感觉到寒风正轻轻摇着他的衣摆，冷却他的脸颊，他的双脚正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然后，他听见拿破仑清清喉咙，慢慢地喊：“预备——瞄准——”在那一刻，他知道一切无关痛痒的感伤都将永远离他而去，而眼泪流到脸颊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自他身上奔泻而出。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安静之后，毛皮商人听到有脚步声靠近他，他的眼罩被解了下来。因为突来的阳光使得他睁不开眼，他可以看见拿破仑的眼睛深深地又故意地望着他，似乎想看穿他灵魂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拿破仑轻柔地说：“现在你知道了吧？”

## 名人也“啬皮”

80 年代初的贾平凹，远没有今日的风采。

那时候的贾平凹，才走出校门，供职在一家出版社，当一名为别人做嫁衣的小编辑。住六楼上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抽一毛多钱一包的劣质烟。一边和乡下的俊子谈恋爱，一边写那些轰动全国的文章。房间太小，又高高在上，他常为不能接触地气而苦恼，于是便商量搬到我家来住。

我家住在古城之北的方新村。那原是唐朝尚书省的西花园，李白醉草吓蛮书的地方。离他们出版社虽只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却是一片原野。小小的村落，只有数十户人家。榆钱才败槐花又开，东家鸡叫西家狗吠，便很得他的意趣。因为我乃本地土著，便也有了三分地皮，两间破房，关起大门，一院子都姓张，无旁姓杂人。

找些砖头支了腿儿，寻一块木板放上去，铺了他带来的被褥，房子的一角变成了他的天下。他告诉我老婆，他是不吃粮的，每顿饭多添一瓢水就足够他吃了。因为他只喝水而不吃粮，所以几年来从未收过他一两粮票，一分饭盒。而那时的自来水又特别便宜，每月每人只收五分钱。他是临时住客，收水费也不收他的钱，这样里里外外，一份伙食费便省了下来。那时候，一张方桌摆在我和他的床铺中间。星期日大早，各自在两边坐了，铺开稿纸，说声写，便同时下笔。笔和纸在不停地摩擦中，常发出一种蚕吃桑叶的声音。七八个小时下来，通常是我问一声：“我快结尾了，你呢？”他便说：“我也结尾。”于是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便同时结了尾。那时的我们，好不洋洋得意，好不目空一切。我那时在工厂当工人，一礼拜只有礼拜天属于自己，一天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已相当嚣张了。七八个小时的重脑力劳动，手指僵硬了，半个身子也有些麻木，该好好歇息一下了。这时的贾平凹却又在嘿嘿的笑声中铺开稿纸说：“我又开始了。”贾平凹后来声名远播，其神秘处全在这里。像他这样玩命的角色太少了。他要不成大名，也就天理不容了。

他作品发得多，稿费自然也比我多。每一笔稿费对于我，我认为就是街上拾来的钱，没有摊任何本钱嘛，花了工夫，贴了脑子，就和下了一天棋一样，难道能算成本钱吗？记得《天池泪》寄来稿费 80 元，从邮局出来买了半只羊，弄了几瓶酒，交到老婆手上也就剩下 30 元了。他的《满月儿》稿费是 83 元，那是他当时短篇里稿费最高的一篇。他惊喜地说，一篇稿子顶一个半月的工资哩！我和他一同去北大街青年路邮局取稿费。83 元取出来了，他却一定要存个整数。我说你存上 50 元，33 元拿出来庆祝一下行吗？他说，存够一百元就是最大的庆贺。他那时候准备结婚，每一分钱都很重要。于是，我俩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只凑够了 15 元。他央求存款的办事小姐，能不能把 98 元的利息先算进去存够 100 元。到时候

少取点利息就行了，小姐鼻子里像害了鼻炎似的嗤嗤了两声，平凹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于是他便再翻口袋，终于在工作证里翻出来了 2 元零 3 分钱的邮票。他把邮票推到小姐面前，极其大方地说；“ 三分钱零头不要了，存一百整！ ”

小说一篇篇写，稿费一次次来，几年下来，他已经有厚厚的一摞支票了。那些支票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用皮筋扎起，放在一个注射药剂的空纸盒里，锁在抽斗的最里面。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加起来也不到 3000 元。

那年二天，有位朋友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出手，要 400 元。我手头只有不到 200 元，于是便第一次开口向贾平凹借钱。他听我借钱要买电视机，大吃一惊：“ 你想买电视机！那是咱老百姓也可以买的东西？ ” 我既然开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点面子他总要给的。他显得非常为难，说了一堆谁谁谁来借钱，谁谁谁借了钱到现在也没有还的话。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钱：“ 不给利息，100 天保证还账，赖一天罚 5 元，你可以扣我的稿费单子。 ”

他沉吟良久，觉得不借给我似乎也下不来台。于是心生一计，说借钱可以，但要苍天作证，凭运气说话。他拿了件蓝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让我伸进手去，就像在暗箱里装胶卷那样，只准摸一张支票出来。摸多少就是多少，不够了自己再想办法。

他这一招很厉害，他那支票里，百元以上的没有几张，有许多张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张，摸上一张 20 元的，又不顶用，又要领情。但我也知道他有一张最大的是 700 元。那是《山地笔记》出集子的钱。这已经是贾平凹给足了面子，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手从蓝衣服下面伸进抽斗，摸着了盒子里的那一摞支票。手指头上没有长眼睛，实在分辨不出支票上的钱数。贾平凹站在旁边，抽一支烟得意地说：“ 摸呀，过 3 分钟摸不出来，宣布协议作废，可别说我不借钱给你！ ”

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这些支票在金额的排列上不可能没有规律。他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点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业余爱好。于是我便想到乡下的俊子这几天要来，到时候他肯定要把支票拿给她看，他要让她有个惊喜：哇，这么多钱！那就是说，最上边的一张极有可能是金额最大的一张。于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张。果真不假，是那张 700 元的支票。

贾平凹傻眼了，我得意了。

又一夜，作家工作人在我家闲坐。那时候贾平凹已结婚，带着女儿和俊子住在我家隔壁，是租农民的房子。午夜时分，王作人告辞，路过贾平凹院门，顺便进去问他一声。俊子正在院里洗衣服，问贾平凹时她说在床上打滚呢，肚子疼。隔着窗子一瞧，贾平凹赤条条穿个小裤衩，大虾一样蜷在床上。还不赶快送医院？俊子说，半夜三更的，又没有救护车。我和老王都急了，说要什么救护车呀，靠在墙上的架子车就是救护车！于是便抬了平凹出来放在架子车上，一人拉一人推，俊子推着老王的自行车在后边跟着，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中心医院。

医生诊断为消化不良加感冒，打了一针柴胡，便让我们拉着他回家了，出了北门，已是凌晨 3 点多了。天热，路旁的瓜摊上还有生意。我便让平凹请客。拉了半夜车，一定要买个西瓜酬劳一下，平凹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 2 元钱一张币来说，那就买个小点的吧，我把钱扔在瓜摊上说，买 2 块钱的西瓜！那时西瓜 5 分钱 1 斤，2 块钱能买 40 斤。卖瓜人挑了两个最大的瓜搬到架子车上。贾平凹怀里搂一个，双腿夹一个，一路上直嘟囔，嫌瓜买得多了。回到家后，两个西瓜都有些烫手。杀开一看，全是生的。他的病却好了。原来是那西瓜吸了他身上的热度的缘故。贾平凹说，早知道买两个西瓜搂一搂，倒能省去打针挂号的钱。如果瓜再是熟的，那就更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贾平凹一个人趴在小学校操场上的水泥板上又写上了。我走到他身后，一把抽了他的笔说，你不要命了！折腾了半夜，病还没有全好，写什么写！

贾平凹那一时动了真情，两行清泪一下就滚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心里便慌了，忙扶住他的肩膀摇着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月常在，你何必贪这一点工夫！ ”

贾平凹那天说了他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说的一段真话：“ 我是个山里娃，我凭啥在城

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枝笔吗?还要养家糊口，有老婆有孩子。我又吝啬，是有名的啬皮，如果不写文章，谁愿意和我交朋友?其实我也不想啬皮，几块钱多写篇文章也就够了。关键是在我眼里，两块钱不是两块钱，是白花花一堆盐!小时候，母亲让我去买盐，两块钱要缝到衬衣口袋里，到盐店让卖盐人拆线。两块钱的盐，是一大家子人好长时间的惟一调料，你今后要辜我，就硬宰。我当时心疼一下，过后也就认了，但不能超过 5 块钱! ”

当今的贾平凹，早不是原先模样了，他成了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几个文学大腕之一。挣下的和省下的稿费怕这辈子早够花了。但青山依旧，本性难移。有外地朋友到西安会他，到了吃饭的当儿，他自然是要请朋友们吃顿饭了。通常，他只请朋友们去吃葫芦头泡馍。那饭经济实惠，极容易给客人留下记忆。饭菜端上桌子，他便问：“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 ”然后自己回答：“葫芦头就是猪痔疮! ”

一语即出，四座皆惊。记忆里更深了一层，胃口却也倒了。于是便给主人省下不少钱呢！

## 笑声长留人间

马老三立走了，走得简朴、平静，没有兴师动众，一派平民本色。然而他留给人间的却是一串串响彻云霄的笑声。

2001 年 12 月 8 日，在他 88 岁告别舞台也是庆祝他从艺 80 周年的晚会上，那一段快板真绝!说得大家前仰后合掌声不断。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非把你逗乐不可。他成了中国幽默的化身!大半辈子历经贫穷、困苦、坎坷，但他终生都在追求“逗你玩”。他说自己“身高五尺四寸，体重从小到老，始终没能超过一百斤，看来今后希望也很渺茫”。他还在“垫话”小段中拿自己开涮：“我这人呀生来就没好命，这名儿就不吉利，马——三——立，一匹马只有三条腿，还立着，不用人推就倒了! ”

1956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莅临天津，在干部俱乐部南楼接见各界 50 多名代表。毛泽东主动向马三立伸出手来握着。马三立立即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 ”毛主席点头表示：我早认识你了!一边摇着马三立的手，一边笑着说：“啊——买猴子!买猴子…… ”毛泽东含笑打量着马三立，摇着头说，“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呃? ”同年秋天，在政协礼堂国庆招待晚会上周总理听了《买猴儿》，倍加赞扬，说：“很有教育意义嘛! ”这一年他还说了《十点钟开始》，真是个丰收年。在天津市曲艺团与广播曲艺团合并时，市文化局下文件任命他为副团长。

刘连群在《马三立别传·买猴儿篇》中说：“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而走红的，不少；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走红而又倒霉的，不多；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大为走红而又大倒其霉后来又大为风光的，极少——这就值得一写了。”

《买猴儿》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时任天津戏曲学校校长、天津人艺副院长——何迟，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这一个段子，塑造了名满天下、生命力至今不衰的典型人物——马大哈。但是反右派运动来了，何迟倒霉了，马三立也没好了。在报刊上展开了大讨论：“难道俺们商业干部是这样的吗? ”可见，阉割相声的讽刺功能的风气，由来久矣!

天津广播电台共有五百多名员工，只批出了四名右派，上级认为太少了，又分下来十一名指标。马三立在劫难逃。论级别：三级演员；论工资：233 元；论名气：如雷贯耳。就这三条儿，扣上一顶右派帽子，其警诫轰动效应肯定超过小演员。

马三立戴着帽子被发配到天津军粮城农场劳改。就他那个干巴样儿，能干啥活儿?那就让他拔草、挑暖瓶送水吧……农场场长跟马三立开玩笑说：“我当场长，没犯错误，才挣 62 元；你当了右派还挣 170 元。”大跃进时，饥饿开始了，老百姓可惨了，包子馅儿用被火碱烧过的稻草切碎当代食品，吃后胃肠没法消化，马三立又以“逗你玩”的方式为平民说话了：“这叫新的副业——打草绳儿! ”就凭这句话，就可以给他扣个“现行反…… ”。晚上开会稀稀拉拉没人来，场领导叫广播员向全场广播：“今天晚上由马三立说相声，大家快来吧! ”在

这样艰难困苦环境中，马三立仍然有号召力，他没忘给大家送欢乐。

他曾对马季说过："什么叫相声，马三立就是相声；"谁叫马三立?相声就叫马三立！"他一辈子创作、改编、演出新段子六七十个；说的传统段子 200 多个。按成就、资历和天赋，他堪与候宝林比肩，"大师"、"泰斗"的称谓，当之无愧，但凡是与马老有过接触的演艺界晚辈，没有一个不说他普普通通，平民本色，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找不到一丁点儿"大腕儿"的架子。朴实是一种人格力量!

像马三立、侯宝林、新凤霞这样一些"国宝级"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贫寒，献身艺术，不图虚名，热爱祖国，承受苦难，终生无悔。他们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保持着旺盛的创造生命力。他们只需要一个共同的称呼就够了：平民艺术家。他们的德艺实践启示我们：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无论你在台上怎么挤眉弄眼，在台下为观众签多少个名儿，转眼之间就会被人忘记乃至抛弃。

马老走了，侯宝林早走了，他们会带走相声艺术的繁荣吗?这个球，只好踢给今天相声界的中青年朋友了。

## 留学巴黎

——冼星海/ 文

我曾在国内学音乐有好些年。在广州南大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正在考虑之际，凑巧得×××兄的帮忙，介绍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给我，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穷困，在 1929 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

到了巴黎，找到餐馆跑堂的工作后，就开始跟这位世界名提琴师学提琴。奥别多菲尔先生，过去教×××兄时，每月收学费 200 法郎(当时约合华币十元左右)。教我的时候，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就不收学费。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加隆先生，跟他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一种作曲要经过的课程)。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收学费每月也要 200 法郎，但他知道我的穷困后，也不收我的学费。我又跟"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唱歌学校——是巴黎最有名的音乐院之一，与巴黎音乐院齐名，也是专注重天才。与巴黎音乐院不同之处，是它不限制年龄。巴黎音乐院则只限廿岁上下才有资格入学。此外，它除了注意技巧外，对音乐理论更注意)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学作曲，他算是第一个教我作曲的教师。以后，我又跟里昂古特先生学作曲，同时跟卑先生学指挥。这些日子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生活穷困极了，常常妨碍学习。

我常处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日寸候却又太少。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做下贱的跑腿。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最糟的有时一早 5 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 12 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 9 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连人带菜都摔倒在地，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我很不愿意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因此，同事对我很不好，有些还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还打骂我，因此我也常打架。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他看我学习时，总是找出事来给我，譬如说壁上有尘，要我去揩，等等。但我对他很好，常常给他写信回家[东北)，他终于感动了，对我特别看待。给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

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的问题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这些人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外国的流浪者(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们知道我能演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演奏，每次给一二百法郎，有时多的一千法郎。有对白俄夫妇，已没落到做苦工，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

我这样的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苦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他们都很有钱，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但不借给我一文。有时，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但他们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鼓励我，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常送我票。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他的提琴独奏时，不厌我穷拙，给我坐前排。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时时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气，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我写了好多东西，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有整齐的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 1932 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旧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愁、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分裂、国民党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我的思念、隐忧、焦急。

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国的时候，我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工夫完成，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工夫。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坏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觉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吹灭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战，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旧俄(现在已统称苏联)的音乐家，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珂菲叶夫也很爱它。并且它能在巴黎播出(上面说过的《索拿大》也被播)和公开演奏。

大概因为作品和别的先生的介绍，我侥幸认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普罗·刁客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印象派)。更侥幸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种援助，送我

衣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还派他的门生送我乐谱、香烟(我当时不抽烟，没有收下)，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在这以前，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亲自弹奏过我的作品，她鼓励我不要灰心，她教我学唱，学法文，经济上不时周济我(她的母亲待我也很好)。在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我伴奏。

报考的那天，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又是中国人。我对门警说，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也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级班过去只有× × ×兄入过提琴班。这样就难怪他阻挡我了。正在为难，恰巧普罗·刁客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

我总算万幸考入了高级作曲班，考到了个荣誉奖。他们送给我物质的奖品时，问我要什么?我说要饭票，他们就送了我一束饭票。入学后，我专心学作曲，兼学指挥，并在“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学音乐理论。在生活上较有办法了。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刁客先生更常帮助我。不过比起别人来，我穷得多。学习上物质的需求还很难解决，如买书就不易，所以我几次要求政府给公费。照我的成绩及资格说来，一是应得公费的，但祖国政府对我的几番请求都没答复。学校给证明，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理欧也有证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我记得有一年，有个要人到巴黎来，找我当翻译，我顺便要求他给我想法资助去德国学军乐(那时我还未人巴黎音乐院)，回来为祖国服务。他那时虽是对外宣传中国需要抗日，却不能答应我的请求。而我人了巴黎音乐院之后，要想指望政府给公费，就更困难了。结果是从始到终一文公费也领不到，我在巴黎音乐院的几年生活，只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

1935 年春，我在作曲班毕了业，刁客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临行时，上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了却她的盛意，我对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许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还有许多书籍稿件也放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大概现在还在吧！

1935 年初夏，我作最后一次欧洲的旅行。几年来我把欧洲主要的许多大小国家的名城、首都都游过了，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最后一次到伦敦的旅行，却很不顺利。登岸时，英政府不准我入境，他看见我的证明文件及穷样子，以为我是到伦敦找事做的，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几个钟头，亏得能打电话到公使馆才被释放了。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视的，英国的成见尤深。

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非但生前被唾弃，死去 9 年后仍有人要开棺鞭尸。社会精英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一闪即灭。

## 徐悲鸿的画格与人格

“我代表我的祖国”

徐悲鸿 19 岁时由家乡宜兴到上海去谋生，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21 年，他到法国去留学，有个外国学生竟当面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的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进天堂里深造，也成不了才。”爱国心强烈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后，既学习油画，掌握人体素描的技巧，又研究马的生理结构，画了一千多幅活马速写。在校头一年，他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弗拉蒙先生的好评。在多次的竞赛中，他都获得第一名。1924 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画展，所创作的油画《萧声》《琴课》等，轰动了当地美术界。那个曾经向徐悲鸿挑衅的洋学生，不得不放下臭架子，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一幅奔马惊元帅

1934 年 4 月，徐悲鸿到欧洲各地举办画展，“ 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去 ”。当他到达莫斯科后，其画展很快就在宏伟的国立博物馆正式揭幕。

徐悲鸿画马，举世闻名。苏联对外文化局局长阿洛赛夫却向他提出一个请求：为观众作一次画马的现场表演。徐悲鸿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充分运用中国画独有的线条，浓淡相宜的水墨色素，洒洒数笔，一匹势不可当的奔马便跃然纸上……顿时，掌声响彻整个大厅。

在拥挤的观众群里，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在人群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徐悲鸿当场画马。他叫布琼尼，是苏联的骑兵元帅，素有爱马之癖，且为世人所知。随着观众的掌声，布琼尼激动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不客气地拨开挡在他前面的观众，大步走到徐悲鸿面前，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直率地说：“ 徐先生，请将这匹马赠送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 ”

徐悲鸿被布琼尼的幽默话语逗笑了，欣然点头，并立即题上款赠给布琼尼元帅。布琼尼像打了大胜仗。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大声称赞道：“ 徐先生，你不仅是东方的一支神笔，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奔马，比我所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加奔放、健美！ ”

跻身《田横五百士》中

徐悲鸿创作过一幅《田横五百士》的作品，这幅画宽 4 尺多，长约 9 尺，取材于战国时期田横辞别海岛五百壮士的壮烈故事。画面右边是田横和他的两位战友，他们正在与画面左边的人群拱手作别。1936 年 7 月 5 日，广西第一届美术节展览会开幕。在展厅中，徐先生的杰作《田横五百士》赫然在目。

当时的广西民政厅长雷殷将这幅画观赏良久后，忽然发现画面上送别的人群中有一位英姿勃勃的壮士，其容貌、神情与画作者难辨为二。他禁不住笑着问徐悲鸿：“ 这不是徐先生吗？ ” 徐悲鸿颔首微笑，答道；“ 我钦敬五百壮士的忠义气节，所以把自己画了进去。”

向马车夫赠画

1943 年的秋天，徐悲鸿在成都举办了画展。画展结束那天，他和夫人廖静文等乘马车去新都桂湖。到达目的地后，牝马已气喘吁吁。马车夫看到，就赶快去亲抚他的爱马。徐悲鸿为此举感动了。付过车钱后，他也伸手爱抚着牝马那隆起而光滑的脊背，像对亲密的朋友似的深情地说：“ 谢谢！ ” 接着，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幅卷起的《奔马》送给车夫，说：“ 这个给你。” 马车夫呆望着徐悲鸿，仿佛没听懂他的话。廖静文在一旁解释说：“ 这是一张画，是送给你的。” 马车夫这才感激地接过画。

倾心收藏晚辈佳作

1946 年 10 月底，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收下了一名陕西的穷学生韦江凡，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一天午饭后，他逐张审阅韦江凡的素描作品，当翻到一张描绘黄宾虹教授讲课时的速写时，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 好！这真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妙极了！ ” 还专门让夫人廖静文做了几样陕西风味菜，请韦江凡吃饭以示祝贺。

饭桌前，徐悲鸿得意地说：“ 一个老师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又有了进步。” 接着，他又情真意切地提出，“ 这幅速写就送给我吧，我要把它收藏起来，还得用它来教我今后的学生。你不会反对吧？ ” 韦江凡有点为难地说：“ 徐校长，这怎么能成呢！您收藏的都是中外名家作品，拙作哪值得您收藏呀！您能多看上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 你这个看法可有点形式主义哟！ ”徐悲鸿接着说，“ 我收藏作品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首先不看是谁画的，而是看这件作品好不好。只要我认为有收藏价值，即使是小学生画的，乡间无名艺人作的，我都乐意收藏起来。倘若作品不好，没有收藏的必要，即使是世界名家的作品，我也不考虑！ ” 就这样，韦江凡的这幅速写被老师收藏起来了，这对韦江凡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1949 年，在兰州部队工作的黄胄，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美术爱好者。为了取得专业画家的帮助，他把自己满意的画稿选了一批，寄给在北京工作的韦江凡提意见。韦江凡就把这些画稿交给老师徐悲鸿指教。徐悲鸿认真地审看黄胄的画稿，其中有一幅《爹去打老

蒋》的国画深深吸引了他，他连呼：“蛮好，蛮好！称得一上是意新笔奇……有着多么强烈的时代感啊！”于是，他决定把这幅画推荐给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评选委员会并当即派人送到了评委会办事处。

初选、二选时，徐悲鸿都去了，反复介绍这幅画有多好。终选那天，他因重要事没去。评委会有几位委员对此画持不同意见，还是郁风看了画说：“徐院长一再推荐，多次说好，是有道理的，我看就通过了吧。”第二天，当徐悲鸿打听到《爹去打老蒋》最后选上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这幅作品终于在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不仅受到在京绝大多数美术家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和欢迎。

美展结束后，徐悲鸿想把《爹去打老蒋》作为佳作收藏起来，又怕黄胄不肯割爱，就让韦江凡去联系，或是用自己一幅画交换，或是出钱购买。韦江凡听了后，打断他的话说：“徐先生，我看用不着商量，我可以全权代表黄胄同志，把这幅画送给您。黄胄那边我自去说，他肯定会乐意的。”徐悲鸿的关怀、指点给黄胄鼓舞很大，他以此为动力，勤奋努力，几年后就成为新中国画坛上的一员骁将。

## 他放走了希特勒

歌德曾满怀敬畏地将历吏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其实这个作坊大部分时间只是冷漠枯燥地记录着一件又一件琐碎平淡的事情，然而在某个时刻，这个作坊又会爆发出最富想像力的即兴之作，而在这些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某个仅仅持续了一天或者一小时，甚至是几秒钟的事件就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甚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1918 年 9 月 28 日就是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时刻。这一天，27 岁的英国二等兵亨利·坦迪与 29 岁的德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在法国小镇马尔宽相遇。

最勇敢的英国士兵

亨利·坦迪 1891 年 8 月 30 日生于英国沃里克郡利明顿。坦迪早年生活困苦，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儿院度过，成年后他在利明顿一家旅馆干过锅炉工。1910 年 8 月，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穷小子加入格林。霍华兹步兵团，开始了他的军旅冒险，同年，坦迪随步兵团第 2 营辗转南非、根西岛等地服役。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914 年 10 月，坦迪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血腥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两年后，他在著名的索姆河大会战中脚部负伤。伤愈后他随第 9 营在佛兰德等地与德军苦战。1917 年 11 月，他再次负伤住院。次年，坦迪被送往第 12 营。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因伤亡惨重被解散，坦迪被分配至惠灵顿公爵第 5 步兵团。在此后的战斗中，二等兵坦迪似乎时来运转了。1918 年 8 月 28 日，坦迪因作战英勇被授予“优异战斗勋章”；9 月 12 日，他在哈维林肯特战斗中因英雄主义表现被授予“军事奖章”；同月 28 日，在夺占马尔宽渡口的激战中，坦迪的英勇表现又为他赢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战争结束后，坦迪随惠灵顿公爵第 2 步兵团在宣布罗陀、土耳其和埃及等地服役。1926 年 1 月 5 日，他以中士军衔退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坦迪是战争期间获得荣誉最高的英军士兵。如果他是个军官的话，王室毫无疑问会册封他为骑士。然而，坦迪决不会想到，在如此荣耀的经历中，他铸成了一桩历史大错。

命运时刻

在夺占法国小镇马尔宽渡口的战斗中，英军战报 5 次提到坦迪的英勇表现。1918 年 9 月 28 日这天，坦迪所在的步兵团一度被德军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所压制。二等兵坦迪跃出战壕，只身一人匍匐靠近德军阵地并成功地消灭了德军机枪手。抵达渡口时，他再次冒着密集的炮火率先铺设起木板，使英军冲锋部队得以顺利冲人敌人阵地。紧接着，坦迪与战友一起与德军展开刺刀战，最终迫使人数占优势的德军退出战斗。

两军的血腥厮杀渐渐平息下来，德军或投降或撤向后方，英军亦无力再战。突然，坦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德军伤兵。这个一瘸一拐走出阵地的德军士兵也看到了不远处坦迪的枪口正死死地指着他。然而，这个伤兵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他既没有举枪也没有惊惶失措，只是毫无表情地盯着坦迪，似乎在等待已无可避免的最后时刻。“我当时的确瞄准了，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坦迪日后回忆起当时戏剧性的一刻，“我让他走掉了。”

这个年轻的德国伤兵略略点了点头，然后就慢慢走远了。历史在这一刻忽然转向了。这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军下士与德军残部顺利撤回后方，而坦迪很快也淡忘了这个战斗结束时刻的小插曲。1919 年 12 月 17 日，英王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亲自为他挂上“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为表彰这位士兵英雄在战争期间的杰出表现，当时的英国报纸对坦迪的战功广为报道。意大利艺术家福蒂尼诺·马塔尼亚专门创作了一幅以伊普尔战役为背景的油画，坦迪在画中背着一个伤兵，以示这些勇敢的士兵是在为“结束一切战争”而战斗。

历史是个创造命运的大师，荣誉纷至沓来之时，大错已无可挽回。1926 年，35 岁的坦迪荣归故里，娶妻生子，过起了平静的生活。谁又会想到，不到 10 年，命运之神就又来打扰他了。

往事成新恨

1938 年的欧洲，风雨如晦。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意前往德国与元首希特勒会谈。这位已是 69 岁高龄且从未坐过飞机的大英帝国首相居然肯降尊纡贵，希特勒大喜过望。双方商定在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新近修成的私人别墅见面。

9 月 15 日，张伯伦长途飞行 7 个小时，又坐了 3 个小时火车，终于到达建在山头的希特勒的别墅。令首相大感惊奇的是，这位德国元首的客厅里赫然挂着一幅马塔尼亚当年为坦迪所作画像的复制品。希特勒解释说：“画中的这个人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德国了，上天将我从英国士兵瞄准我的枪口下救了出来。”

张伯伦当时心中有何感想已不得而知。或许他心里在暗想，坦迪要是扣动了扳机，欧洲今天的这场灾难可能也就无从而起了。

无论如何，希特勒希望首相回国后向他的这位英国“救命恩人”转达最衷心的感谢。首相表示会设法转告。然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祝福对坦迪无疑是命运的一记重重的耳光。

历史的恶作剧

消息传到英国国内，举国震惊。一些历史学家对如此戏剧性的一战轶事深表怀疑。然而，谁又会如此无聊地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呢!

希特勒所属的李斯特团 1918 年 9 月的确驻防在马尔宽渡口地区，由于德国的大批官方历史档案毁于战火，希特勒本人的回忆录又以混乱和前后矛盾著称，因此 9 月 28 日这一天希特勒在这场混战中的确切位置已无从考证。尽管如此，希特勒本人对坦迪的兴趣却是有据可查的。1937 年，格林·霍华兹步兵团公报曾有一段记载，称厄尔上校从一个自称施瓦德博士的人那里听说德国元首非常想要一幅马塔尼亚创作的英军油画。厄尔上校不久就送去了这幅画，希特勒的副官魏德曼上尉专门致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您所赠礼物已由施瓦德博士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抵柏林，特此表示感谢。元首对那些与他个人战争经历有关的事自然是感兴趣的。我给他看您所送的画时，元首很感动。他指示我向您转达他本人最诚挚的谢意。”

对于坦迪来说，这则往事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据坦迪的外甥威廉·沃特雷回忆，60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就在欧洲大战的阴云再次聚集、张伯伦首相亲自前往德国“绥靖”希特勒之后，坦迪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挂上电话后坦迪向家人承认，来电者正是首相本人。首相说自己刚返回伦敦，在贝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了一幅马塔尼亚创作的格林·霍华兹步兵团在梅嫩(Menin，比利时境内——译注)渡口但战的画像。他问希特勒是怎么回事，后者指着画中的坦迪说道。“就是这个人，他差点打死了我。”

有时候，追忆的往事总是有些混乱。坦迪事后回忆，说自己在大战期间曾多次放过伤兵

或已放下武器的德军士兵。因此，对于希特勒与坦迪两人的命运交叉时刻到底发生在马尔宽渡口还是梅嫩渡口，历史学家众说纷坛。无论如何，希特勒本人对坦迪的特殊兴趣似乎是最好的证据。这位元首对自己在一战中的英勇作战历史的确非常自豪，但他决不会无缘无故选择一张描绘英军胜利的油画来满足自己的回忆。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早年的经历与坦迪颇有相似之处。大战爆发时，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巴伐利亚第 16 步兵团。此后，他也参加了 1914 年第一次伊普尔会战。希特勒在战斗中也有英勇过人的表现。为此他两次受伤，两次获“铁十字勋章”。这个政治狂人此时已深受瓦格纳戏剧的影响，认定自己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认为二等兵坦迪当时之所以没有扣动扳机，完全是上天的安排。因此，他决不会忘记在那个命运时刻指着他的那个枪口和坦边的那张脸。此后，希特勒在报纸上看到了坦迪被英王亲自授勋的消息。对这件事，希特勒显然牢记在心。上台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设法搞到一张马塔尼亚为坦迪创作的画像，以标榜上天对他的刻意关照。

不幸的是，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油画在盟军攻入贝希特斯加登“鹰穴”后不知去向。

此恨绵绵

再说坦迪，昔日的荣誉与征战往事突然间成了最折磨人的记忆。由于他的“善行”，整个世界陷入了一场劫难，数以千万计生灵涂炭。1940 年，坦迪移居考文垂，他目睹德国空军将这座城市炸成平地。此后，他在伦敦再次亲历纳粹空军的狂轰滥炸。他对一位新闻记者痛苦地感慨道：“要知道这个家伙会是这样一个人，我真该一枪毙了他。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弱妇孺被他杀害，我真是有愧于上帝啊！”

时年 49 岁的坦迪再次报名参军，但他在索姆河会战中所受的重伤使他已不能重返战场。虽然这位老兵此后忘我地投入到国内志愿工作之中，但对往事的记忆却时时折磨着他。1977 年，坦迪在考文垂去世，享年 86 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马尔宽渡口英军阵亡将士墓中。3 年后，坦迪的遗孀将他所有的军功章以 2．7 万英镑的天价出售。1997 年停战纪念日，几经转手的军功章被赠予坦迪当年曾服役的步兵团。今天，这些宝贵的勋章被陈列在格林·霍华兹步兵团团史纪念馆，它们将永远提醒人们记住人类的这个命运时刻。

## “汉奸”郭嵩焘

多年以来，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公元 1883 年正月初一，65 岁的他看着镜中苍老容颜，心绪甚为寥落。在纪年诗中，他写道：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

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这年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 4 个年头了。自光绪五年(1879 年)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

如果不是因为造物弄人，去了一趟洋人的国家，郭嵩焘仍将被士人所尊崇。

出使英国以前，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

不过，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

梦醒者的痛苦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做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

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

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沦，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的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 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三大“罪名”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刻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蒸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帅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

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 1879 年 5 月 5 日乘船到达长沙。与时洲阴正好发生嚣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饮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思想先驱者的命运

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

如果说，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是治本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那么，在 1884 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遗折说：“大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同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情欤？”同时，此折中还有“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语。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体西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因此，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因为实质上讲，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中体西用”说，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癸未年前后，小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十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济，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 1879 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井盼朝延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延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它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二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主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迫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 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者不准行。”直到他死后 9 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 讲台上的名家风采

辜鸿铭　这个清末国学大师在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致礼；下课后，他先离去，学生再走。(二)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上课检查若背不出，不许坐，要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受得住约束的听课，受不了的可趁早退堂——如此做法，现在的大学教师一般不会这么做，中学教师一点也不敢这么做。可他要求虽严，但古文烂熟

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抱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梁启超　他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先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他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马想起，又继续大段大段往下背。有时讲课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己，或掩面，或顿足，或狂笑，或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而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而涕泗滂沱。听他的课，实在是种享受。

刘文典　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秘书长，对《庄子》《文选》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嗜吸鸦片，上课时无法过嫣便狂吸纸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语音含糊不清。讲《文选》时，只听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他是书生，也是狂生，自诩为全世界两个半《庄子》研究权威中的那半个。教《昭明文选》，一学期才讲了半篇内容玄虚的《海赋》。

鲁迅　进出教室都极为迅速，爱穿玄色衣服，一身的“黑”。一开始讲话，教室很快就安静下来。讲课侃侃而谈，幽默风趣，每一句话都充满感情和力量，使学生感到意味深长。有一回讲到《红楼梦》，鲁迅先生笑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他知识渊博，讲课时能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需要时信手拈来，不用时挥之即去。

南怀瑾　台湾当代国学大师，著有《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等学术著作。他能把枯燥无味的古代哲理文化课讲得趣味横生。据台报报道，成功大学学生最讨厌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并把最不受欢迎的讲课者称为“三四五教授”。南先生得知后自告奋勇到成功大学讲四书五经。不到一个月，他上课的教室人满为患，学校只好安排他到礼堂授课。

聂绀弩　著名杂文家、诗人，师从鲁迅。聂绀弩在中央文学讲习所讲《水浒》，没有讲义，事先也不准备，他叼个烟卷，在台上转来转去，随意发挥，一讲就是几个钟头。

沈从文　沈从文 26 岁那年第一次登上讲坛，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呆了 10 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 10 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再也无话可说，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第一次登台，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为他的“可爱”大笑不已。沈从文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重，学生很不好懂，而且讲课没有讲义，毫无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类似聊天。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近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

闻一多　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黄昏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他主讲的《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等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他上“楚辞”，第一节课打开一尺半高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道：“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将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颇受欢迎。闻一多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仅要求学生每人交一份读书报告。

吴宓　“红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讲《(红楼梦)研究》，见下面女学生没座位，就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有风度的男生也跟在他身后去帮着搬，等女学生坐好后他才开讲。他讲“中西诗之比较”，好多学生有兴趣去听，没料到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学前儿童念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俞平伯　也是“红学”家。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沉吟半晌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俞先生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赞道：“好，真好！”沉迷其中，学生欲知如何好法，终不可得。

章太炎　不擅长讲课，但不乏忠实听众，鲁迅等人就坚持听完了《说文解字》。他讲课时慕名来听者甚众，但他口齿不清，讲课时爱随意发挥，漫无层次，常常使听者兴味索然，慕名而来，失望而去。他嗜酒，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候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周作人　通常是坐在讲台上，低头伏案照本宣科，声音细小，即使坐在前排的学生也听不大清楚。

朱自清　教宋词，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他要求学生按时交作业、笔记，还安排月考、期末考试。

## 从牛痘到抗生素

危险的实验

18 世纪终了时，医学界开始对人体有了相当的了解。

医生们注意到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某种疾病人一生只会染患一次，好像身体会“记住”那种疾病，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感染。

天花就是其中的一种。土耳其某个村庄的农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件事，他们甚至找到了独特的预防方法：一有人染上天花，就用针刺患者的水泡，然后刻意用这支针刺穿健康人的皮肤，这些人就会染上天花，但是症状通常不会那么严重。

18 世纪初期，英国贵族出身的蕾迪，玛莉，蒙塔古住在土耳其，她对农民的天花预防很有兴趣，便将这项技术带回了英国。

当时一个名叫爱德华·金纳的医生在英国中部的乡镇工作。他和许多医生一样，使用蒙塔古所传的技术预防天花。他进而发现，在为挤牛乳或照顾母牛的女人们进行预防“接种”后，她们完全没有出现天花的症状，即使天花在四周肆虐，家人们一个个死去，这些女人也不会得病。挤牛乳的女性偶尔也会染上一种类似天花的疾病，这种病的毒性较弱，原本只有母牛才会染上，因此被称为“牛痘”。得过牛痘的人都不会得天花。为了确定这个发现，金纳认为必须跟学者一样做实验。于是在 1796 年，他在一名常在诊所出入的健康的八岁小孩的手臂上刮出两个小伤，再涂上取自牛痘水泡的液体。一星期后儿童发烧，但是很快就康复了。经过几个星期，金纳又在少年的手臂上刮出小伤，这回涂上的液体，是从天花水泡中抽出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致命。如果这个少年能继续活蹦乱跳，就表示金纳的假设没错，牛痘能预防天花。承蒙幸运女神的眷顾，少年没事。金纳借助这个极端危险的实验，证明了天花是能够预防的。他把这项技术称为“疫苗接种”，是取自拉丁文中表示“牛痘”的词语。到了 19 世纪，天花的疫苗接种已经广为世人接受，麻脸的人日渐稀少了。

葡萄酒为什么变酸

路易·巴斯德于 1822 年在法国的多尔镇出生，他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之后，兴趣却转到了化学上。

1856 年，有个酿酒厂主人要求面见已是著名化学家的巴斯德。这家酿酒厂向来都用传统方式酿酒，先把添加了酵母的葡萄汁液倒进大桶子里，然后放置几星期，葡萄汁液就会自然产生酒精成分。这种使汁液变成酒精的过程称为发酵。发酵一停止，葡萄酒就差不多酿成了。

但不知为什么，有许多酒会在最后的装瓶阶段变酸，以致常常无法交货。

酒厂主人请巴斯德无论如何都要查出葡萄酒变酸的原因，巴斯德于是从酵母本身着手。经过几个月研究酵母和发酵的关系之后，他终于发现酵母中的小颗粒其实是活的，这些颗粒

会不断增生，摄取养分，做运动，逐渐地长大，简直就和生物一样。我们现今把这种小生物称为“菌”。葡萄汁添加了酵母菌之后，这些小菌会“吃食”汁液所含的养分长大，并且不断地繁殖。酒精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因此，酒精可以说是酵母菌的“排泄物”。

那么葡萄酒为什么会变酸呢?巴斯德发现，美酒中的酵母菌是圆形的，酸酒中的却是细长形的，形状不一样是不是表示菌种本身不同?巴斯德进一步探查，又发现细长形的菌体和酵母菌是两回事，这种菌体“排泄”的不是酒精，而是有酸味的物质。这也就是说，要防上葡萄酒变酸，只要把这种菌体杀掉就行了。方法不难，巴斯德只是把葡萄酒加热到 50℃，就消灭了不受欢迎的菌体。

这个技术立刻在酿酒业者之间流传，没多长时间，酿酒师就不再为葡萄酒变酸的问题烦恼了。这个技术——现在称为“低温杀菌法”——后来也被用在酒类以外的饮料上，例如牛奶。凡是用这种方法杀菌的牛奶，包装盒上都会标示着“低温杀菌”。巴斯德因为这件事被推崇为“葡萄酒业界的救世主”，可是他并没有止步不前。

巴斯德领悟到，自然界里充满着微生物，而微生物的作用并不只是使果汁发酵，或是让葡萄酒变酸。他在 1858 年发表了全新的学说，主要内容是：如果微生物会危害葡萄酒，那么对人体应该也会，也就是说，人患病的症结就是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后来被命名为“细菌”，巴斯德的学说也就被称为“细菌病因说”。

巴斯德的新贡献

1880 年夏天，巴斯德的一名助手负责为实验用的几只鸡注射霍乱菌，通常鸡一被注入霍乱菌就会立刻发病而死。

可是因为那时候正好放暑假，助手忘了为鸡注射。装有霍乱菌的容器就在暑假期间搁着，等到暑假结束，才拿出来注射。结果出人意料，那些鸡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死去，它们只是稍有点不适，很快就恢复精神了。

于是重新为这些鸡注射“新鲜”的霍乱菌，结果更是惊人，这回鸡根本没有发病!巴斯德想起金纳的天花预防接种，看来助手是在无意中为鸡注射了疫苗。巴斯德于是找来几只鸡，重复同样的步骤，并且用各种方法进行试验，终于制造出了有效的疫苗。这是继金纳之后，第一次制成的疫苗。

现在的问题是，制作疫苗的技术是否也能用来对抗其他疾病。1881 年，巴斯德着手制造炭疽疫苗。炭疽是侵袭牛、羊、猪等家畜的疾病。巴斯德依照之前处理鸡霍乱的方式，首先调制减弱炭疽病原菌的水溶液，然后注入 25 只羊的体内，这些羊在几天之内显出症状，却没有死。然后巴斯德又在羊身上注射活的炭疽病菌，羊群果然没有得病!这个实验证明了他的假设是对的。

既然这种疫苗对动物有效，是否也能做出对人体有用的疫苗?

巴斯德和助手商量之后，决定先试做恐水病的疫苗。恐水病又名“狂犬病”，是狗常有的疾病，染病的狗会出现狂乱的行为。狂犬病最可怕的地方是被咬的人也可能发病，而一旦发病就要痛苦一个月以上才会死去，所以是当时的人们最害怕的疾病之一。对巴斯德来说，这种疾病能同时传给动物和人是一个优点，因为制作的疫苗可以先在动物身上试打，然后才给人使用。

为了证明狂犬唾液中的某种成分就是病原，巴斯德做了许多实验。被狂犬咬到的人，脑部会受到侵袭。巴斯德知道这一点，就先把得病的狂犬脑部晒干磨成粉末，调成水溶液，以减弱溶于水中的病原菌，再当成疫苗注射在狗身上。巴斯德重复做了许多次这个实验，终于制成预防狂犬病的疫苗。1885 年 7 月初，有一名少年被带到他的实验室，这个名叫约瑟夫·迈斯塔的少年被疯狗咬了，如果不想个办法，可能活不到秋天。少年的父母相信巴斯德，让他为儿子注射了 12 支狂犬病疫苗。幸好疫苗发挥了效力，正如巴斯德所期待的那样，迈斯塔捡回了一条命。人类可以用的最早的狂犬病疫苗也就此诞生了。

由于这次的成功，支持巴斯德的“细菌病因说”的学者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开始针对其他疾病的疫苗展开激烈的研发竞争。1897 年出现伤寒疫苗，1913 年白喉疫苗研发完成。过去这些疾病一年要夺去几千名幼童的性命。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所畏惧的疾病，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因为有了疫苗而几近绝迹。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的疫苗也都出笼了。以往几乎每个小孩都会至少得一次这些所谓的“幼儿病”，现在罹患这些疾病的小孩已经很少见了。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天花疫苗最早出现，天花也最快从地球上绝迹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卫生组织成立。这个由联合国运作的机关为有天花患者的所有国家的所有国民进行预防接种，获得了极大的效果，并在 1977 年宣布天花已被消灭了。人类最后罹患天花的人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男性。现在这种危险的天花病毒只留下少许，保存在几个研究机关里。

抗生素的诞生

光靠一种疫苗有时候并不够，而且即使做了疫苗接种，也可能因为得过某种疾病，使得免疫系统无法顺利应付新的病原菌。

例如会强烈产生全身症状的败血症，就是由病原菌——致病的细菌——所导致的感染症，以前有许多人因此病而死。败血症有时会因手指上的一点小伤而发病。最早治疗感染症的方法纯粹是在偶然间发现的。1928 年，在伦敦一家医院值班的医师亚历山大·弗莱明有一天不经意地发现，容器里的细菌都死了，因为上面有一层绿色的霉。霉是一种菌体，当时已为人所知，这种绿色的霉就称为“青霉菌”。

弗莱明这时忽然想到，或许可以用这种青霉菌来击退病原菌。可是，要在实验中培养分量足够的青霉菌并不容易。事实上，他总共花了 10 年，才大量培养出这种细菌。1944 年，使用青霉菌做成的药物终于问世。这种药物被称为“盘尼西林”。光是使用盘尼西林的第一年，就拯救了好几千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

可是，盘尼西林并不是对所有病原菌都有效，其中尤以对结核菌最为无力。有些学者相信一定还有其他细菌可以做成药物，就继续研制新药，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终了时制成最早的结核菌特效药。由于这种药物，结核才变得能够治疗。对抗其他病原菌的药物也陆续研发出来，这些药物被统称为“抗生素”。在现今时代，抗生素已成了医生不可或缺的治疗用药。

盘尼西林在医疗上使用五十多年后，医师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新型的病原菌不断出现，原先所仰赖的抗生素变得效用全无。这种病原菌已经对抗生素产生抗力，亦即具有“耐力”，因此早该在世界上消失的疾病，又在世界各地卷土重来。结核病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不断有人死于结核病，而且如同先进国家在百年以前的情况，变成很常见的疾病。

有耐性的病原菌也可以说是进化论的现成例子。所有物种都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化，病原菌也是生物，而且有不计其数的种类，进化论对这些病原菌当然也适用。有极少数病原菌能够忍受抗生素，它们能在因抗生素而改变的环境中存活，并且留下后代，这些后代也继承了上一代的特质，于是就出现了耐得住抗生素的病原菌。耐不住抗生素的病原菌都一个个死去，最后只剩下具有耐性的病原菌不断繁衍。

病原菌实在很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有些竟然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习惯新的抗生素！如果病原菌照这样进化下去，以后我们要如何对抗疾病呢？有许多学者已经在为未来感到忧心。

人和病原菌一直都在对抗，这场战争可能永远也不会终止，因为病原菌的进化，以前的特效药失去了效用，全新的病原菌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感冒病毒就曾在 1918～1920 年肆虐，夺去世界上约一千五百万人的性命。

20 世纪 80 年代，可怕的艾滋病毒(HIV)开始流窜，目前已经有数千万人受到感染。而在 1995 年，埃博拉病毒也使数百人在短时间内死亡，远比艾滋病毒危险。这种疾病会不会像过去的瘟疫一样，在人类还无法控制时蔓延开来，日前还不知道。无论如何，要避免“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